

康澤的生平與志事 (二)

陳 敦 正

中國日報艱苦一頁

中國日報，於民國廿一年元旦，正式創刊（中國日報社址，在南京明瓦廊「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」隔壁。實際上為「復興社」的機關報），康澤任社長。

按中國日報之前身，原為建業日報，日出一大張，為軍校六期肅作霖、唐縱（乃建）、左曙萍、陳琪等在校同學所經營，因畢業在邇，分發在即，既感經費困難，又感兼顧為難，乃商之於康澤，經康多方籌備改組，達數月之久，改名為中國日報，日出一大張，以與當時南京最大之報紙中央日報併駕齊驅。

康澤初無辦報經驗，創刊之初，一鼓作氣，頗能轟動一時，一新新聞界的耳目，但半年以後，經費漸感不足，收支無法平衡，康澤將他一年政治部主任，兩年宣傳大隊長的薪津積蓄，全皆耗盡，賠累一空。但報紙不能一日不出刊，乃求救於當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之顧墨三（祝同）將軍，願祝同為康澤的老師又是老長官，對康極為賞識與信任，但省府並無固定預算以津貼報紙，

每有所求，亦僅能張羅三五百元，以資應付。當時中國日報連同印刷廠，職員有三十餘人，工友有五十餘名，每月開支，需銀洋七千餘元，三百元，僅够一二日之開支，捉襟見肘，困難可知。那時，江蘇省政府，設於鎮江，乘火車一小時可達，康澤有時無錢買車票，無錢住旅館，祇好深夜乘坐車頂而行（在今日臺灣為不可能及嚴禁之事），到鎮江後，即在車站過夜，第二天上午九時，見到顧主席，取款返京，有時囑其總務翁寧三在下關接應，取款買紙印報，艱苦情形，非局外人所知。一年以後，始在「力行社」領有固定津貼，每月四千元，報紙發行，漸次增至五、六萬份，勉可維持。

中國日報初期幹部有：徐朗亭（總編輯）、鄒代咩（總經理）、張客公（總主筆）、萬子霖（副刊編輯）、翁堅（總務）……等，其後經過了四年多時間，康澤改任董事長，由顧希平繼任社長，先後陸續參加工作者，有任覺五（副社長）、鄒繩武（總編輯）、許君武（總主筆）以及任記者或編輯之黃曼達、范長江（後投共）、林適存（筆名南郭）、劉倚屏、劉慎旃、陳敦正、

林作民、卜少夫、湯武、蔡維屏、張沉長、林棟、林桂園……等多人。中國日報創刊之翌日，康澤與朱素懷女士結婚，雙喜臨門，平添佳話。康仍孜孜不倦，新婚期間，每日照常工作，連蜜月旅行，全都放棄。其敬業樂羣精神，堪稱難能可貴。

中國革命復興運動

廿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二時，日軍突襲我在上海的駐軍，強佔閘北，我十九路軍，就地抵抗，滬戰爆發。國民政府宣佈，遷洛陽辦公，全國枕戈待命。蔣介石應全黨及全國軍民敦請，忍辱負重，返回南京，籌策對日作戰計畫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於焉成立。中央政治會議亦決議：任蔣公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。由於我國向國聯申訴，英、美、法三國使節，居中斡旋，以及國聯特別大會之決議，要求中日停戰，至三月下旬，始獲協議，達成停戰。

是年除外侮之外，偽滿洲國問題、各地赤禍問題、學潮問題、軍事衝突問題、政治紛歧問題……等等，絡繹不絕，真是外侮日急，內憂不已

蔣公在廬山召集豫、鄂、皖、贛、湘五省剿匪會議，宣佈「攘外必先安內」政策。

中國日報在康澤積極領導之下，對上述內憂外患問題，嚴重分析報導，不遺餘力，對鼓舞民氣，培養民族精神，引導青年思想，鞏固領導中心等，均發揮了積極的影響作用。

先是，在先一年秋冬之際，康澤與滕傑、賀衷寒、鄧悌、鄧文儀、蕭贊育等軍校同學，鑒於「九一八」事變之發生，日本軍閥，圖我日急，認為國民黨組織，日趨鬆懈脆弱，已不足以應付當前情勢，乃糾合部份軍校同學及有識之青年志士，思有以復興中國革命，建立革命領導中心組織，發揮黃埔精神，投向時代洪爐，以擔負抗日反共雙重使命。他們積極策劃研究的結果，便在二十一年三月，在南京成立「三民主義力行社」，旋即成立第二、三級組織，「革命青年同志會」、「革命軍人同志會」、「中華復興社」以及各式各樣的外圍組織，如「忠義救國會」、「華僑五濟社」……等，一連貫的組織。以「力行社」為最高領導的核心單位，以「復興社」為積極推行的發展單位。其目的：是想建立革命領導中心，堅強黨的組織力量，團結青年才俊，以及忠勇愛國的軍人，形成黨的領導核心，進而以絕對秘密的黨團運作，強化黨對全國軍民的動力。並先由黨本身做起，然後擴及全體民衆，俾達成一切人力物力的動員，以應當前緊急的需要。此一運動，稱為「中國革命復興運動」，亦稱「中華民族復興運動」，而以「復興社」名於世。（以下概稱「復興社」，含蓋一切——筆者）。

康澤在此一運動中，曾任「復興社」宣傳處幹事，其後任書記。復興社組織，分「幹事」、「檢察」兩會，各設書記一人（助理書記一至二人），向最高革命領袖蔣公負責。幹事會下，設書記、組織、訓練、宣傳、軍事、特務等處。二十三年春，筆者進「復興社」工作時，康因兼任其他要職，外務甚忙，宣傳處幹事由任覺五代理，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，由南京特別市黨部書記長張元良（四川人，軍校三期）代理；助理幹事則為李天民（四川人，現任立委）、俞季虞（浙江人，留俄學生，三十八年於撤退來臺途中，乘太平輪遇難）。幹事相當於處長，助理幹事相當於副處長，但實際上無此名義，因當時領袖揭櫫「重業輕位」意義，重視實際，力戒名位故也。今日寫「復興社」文字者，均強調各處為處長，與事實不符，不無渲染之弊也。

別動總隊與特訓班

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—癸酉），江西共黨蠢動日急，一月，蔣公在南昌召集剿匪軍事會議，確定圍剿計畫，並對共黨下最後忠告，望深切覺悟，恢復人性。五月，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，為積極展開對匪作戰，調賀君山（衷寒）任行營政訓處處長，鄧雪冰（文儀）任侍從室秘書兼調查課課長，又於十月，成立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，派康澤任總隊長，積極組訓民衆，偵查匪情，消除共黨間諜與日本漢奸，協助部隊維持軍風紀，推動社會善良風氣（實踐新生活運動），防止貪污腐化等等。同時，成立特別訓練班

，儲訓別動總隊隊員，以及地方建設所需的各類人材，對匪區重建工作，有很大的幫助，效果豐碩，是以蔣公對康澤，益加倚重和信賴。

其時，別動總隊設於江西撫州（即臨川），特訓班設於廬山五老峯下之星子縣，故亦稱星子特訓班。該班係以原有之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」（設於星子縣）、「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政訓研究班」（簡稱「政訓班」，設於南京）、「軍事委員會交通研究所」（設於南京，由鄧悌任主任）等三個單位，予以合併，作為基礎，劃歸星子特訓班，統籌訓練。其正式名稱為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」。以其駐地為星子縣，外界常捨正式名稱而不名，逕稱「星子特訓班」。康澤以別動總隊總隊長兼班主任，負責訓練。

康主持特訓班訓練工作，約兩年之後，由於別動總隊及其他任務，過於繁重，曾一度薦潘佑強接替班主任。潘為軍校一期畢業，為人忠誠幹練，頗為同儕所稱道，但潘時運欠佳，為時不久，即被調職，仍由康澤繼續兼理班主任，以迄抗戰結束。

潘佑強之被調職（約在二十五年春），事情是這樣的：

某日，蔣公蒞特訓班巡察，檢查內務，頗為嚴格，每以自着白手套，向「死角」部份，到處揩拭，以驗內務之是否整潔，訓練之是否認真。不料，發現掃帚任意倒置地上；至辦公室時，又發現潘用之墨盒乾枯，集合訓話時，復值鼓號樂隊，吹打不甚純熟，旋律不够雄壯，顯見訓練

未臻理想，蔣公不悅，嚴予訓斥，旋將潘氏調職。由此可見蔣公對軍事訓練要求之嚴格也。蔣公離班後，潘佑強當即調集樂隊，怒斥隊長，將鼓號脚踢一空，連呼：「倒霉的樂隊」不已，一時傳為趣譚。

康所主持之特訓班，由於抗日軍事之發展，曾先後遷湖北荊州及四川之酆都縣、合川縣，持續辦理。其主要幹部有：楊文璉（副主任）、張與仁（副主任）、韓文煥（副主任）、胡國澤（教務組長）、上官業佑（訓育組長）……等，或前或後，已難復按，附記於此，以供參考，並為探證史料者追查探訪之線索。

至有關於別動總隊其他情形，容後再為敘述，在此暫時不表。

策劃入川基層入手

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年甲戌），蔣公自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事變，相繼發生後，對國事之處理，焦心如焚，既感「安內」之重要，又慮「外侮」之再起，故揭示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」。深知一旦日寇入侵，長江下游一帶，必將不保，欲長期抗戰，必先安定川、康、滇、黔等地，以為後方根據地，然川康一帶，為軍閥所割據，即成都一地，亦分為三數防區，實令人痛心。康澤為四川人，蔣公早已令其策劃研究，長達數年，康運籌帷幄之間，廢寢忘食，提供各種方策，以供參探。如成立中央軍校成都分校；如派遣參謀團入川；如以別動總隊，從事基層組織活動；如進行川軍中下級幹部之連絡，曉以民族國

家大義；如積極組訓民衆，促進新生活運動；如成立勞動服務團，覺醒其民族意識、愛國意識；如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；如辦理暑期青年集訓等等，均能運用各種方法與力量，以進行之。此種準備工作之籌劃與推行，非局外人所能盡知也。

是年，各項準備工作，漸次就緒，時機漸次成熟，於是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，乃派遣參謀團入川，以賀元靖（國光）為主任，監督指揮四川的剿匪工作。康澤則以參謀團政訓處處長及別動總隊總隊長身分，率隊入川，設總隊部於重慶「浮圖關」（後改名為復興關）。參謀團全銜為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」。其時，康澤一方面須顧及在江西之特訓班工作，一方面又要顧到參謀團工作的積極參與，以及別動總隊的工作佈署，是以工作至為辛勩忙碌。

參謀團是於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正式入川。康對四川方面的作法是：協同川軍圍剿自江西突圍、竄擾川北之「紅軍」（徐向前、賀龍兩部殘餘），將別動隊受過嚴格訓練的隊員，分布各縣市，深入各基層單位，一方面推行國民軍訓與新生活運動，一方面積極組訓民衆，加強宣傳工作，激勵民族精神意識與發揚愛國情操，藉以打破四川各軍閥割據的局面，並監視川中地方一切惡勢力的蠢動，對於後來建立對日抗戰基礎與鞏固後方之作法，已在此時作初期深深的奠定，厥功至偉。

剿匪緝私席不暇暖

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乙亥），二月中旬，南昌行營撤銷，移設武昌。三月一日，武昌行營成立，以張學良為主任，錢大鈞為參謀長，楊永泰為秘書長，參謀團經正名為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駐川參謀團」，刪去「南昌」字樣。國民政府並於四月一日，任蔣公為特級上將，統帥全國海陸空軍，擔負安內攘外、剿滅共匪、抗戰建國責任。五月十五日，參謀團下令：總攻川北徐向前股匪。康兆民策劃指導民衆，積極支援，工作至為忙迫。是月下旬，蔣公以委員長身分，兼「禁煙總監」，在武漢成立禁煙督察處（處長黃天民，廣東人），蔣公任康兆民兼緝私室主任，別動總隊亦同時成立緝私單位，配合行動，採取積極措施。康事忙，恐貽誤公務，薦王元輝為緝私室副主任，負責實際責任。

武漢行營，於十月二十日結束。十一月十三日在重慶成立四川行營，以楊永泰為秘書長，賀國光為參謀長。至十二月下旬，政府復任命楊永泰為湖北省政府主席。

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丙子），楊永泰主鄂期間，康澤以受蔣公特達之知，經常擁有本身職務以外之各種任務，奔走於南京、上海、漢口、南昌、重慶、成都等地，席不暇暖，為蔣公分勞分憂。楊語人曰：「康澤每至武漢，均未見其人？」康聞之，始抽暇前往一晤。其忙碌可見矣。（按：楊於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在漢口遇刺殞命，劉蘆隱涉嫌其事，後被捕。）

西安事變中共詭謀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安發生重大事變，張學良、楊虎城部隊異動，委員長蔣公被劫持，舉國震驚，民情激憤，討伐之聲，如火如荼，康兆民主持之中國日報言論，尤為激烈，每日利用空軍，在西安上空散發，力促張、楊及時覺悟，張、楊知事不可悔，請求蔣公停止宣傳，和平解決，但全國輿情憤慨，不知其情，而中國日報，空投如故，張、楊見報，每訴之於蔣公說：「中國日報，今天又罵我了。」蔣公還京後，不得不予曲飾，乃下令將中國日報即予結束，於翌年元月一日起停刊，故「中國日報」出刊，為時整整五年而已。

當時，政府對張（學良）楊（虎城）之變，有「和」「戰」兩派，爭議不已！康兆民參與營救決策，對領袖之忠誠愛戴，益受重視。

西安事變結束，蔣公蒙難歸來之後，中共施展詭計陰謀，曾於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—丁丑）二月十日，致電中央政府，要求集中國力，團結禦侮，並表示：（一）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；（二）「蘇維埃政府」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，「紅軍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，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揮。

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第六次大會，則於二月二十一日，通過決議：「根絕赤禍案」。針對中共所提四項保證與五項要求，決議四點：（一）徹底取銷其所謂「紅軍」及其他假藉名義之武力；（二）徹底取銷其所謂「蘇維埃政府」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；（三）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；（四）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五屆三中全會閉幕，宣言對外方針，仍當繼續不變，對內共守和平統一信條，決不縱容階級鬥爭之謬說，亦不釀成貧富不均之厲階。對中共態度，異常堅決肯定。中共旋於三月十二日，發表宣言，願開始談判。

是時，蔣公在休養中，仍繼續處理陝變（西安事變）及東北、西北各項軍事善後問題，並策劃感悟共黨，實行三民主義，停止赤化，協力對外方策。對「國」「共」和談問題，蔣公原欲張岳軍、陳立夫兩先生主其事，並由楊杰、張冲等，與中共密為周旋。中共認為與康兆民協商，較為適宜。於是此項繁重而艱鉅之任務，當局並囑康兆民參加，妥為周應。康明知中共缺乏誠意，狡黠難纏，與楊杰、張冲之協商，顯是缺乏誠意，如此轉變，實為故意藉口而已。但康有「以國家為己任」的胸懷，祇要對國家有益之事，每有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決心，以為領袖分勞分憂。

據了解，與中共談判，第一回合中，擬成立「西北長官署」，以丁惟汾為長官，林祖涵（伯渠）副之（中共），以張民權為秘書長，秦邦憲（博古）副之（中共）。並改編「紅軍」為國軍，終以中共食言，卒被擱置。此事丁鼎丞先生紀念集，亦略而不詳（見紀念集第三十頁）。其後，中共在西北，逕自成立所謂「陝、甘、寧三省邊區政府」。

抗戰軍興兼數要職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「蘆溝橋」事起，抗

戰軍興，剿共軍事雖暫結束，而共黨之政治攻勢及顛覆活動，反變本加厲，以延安為巢穴，對中央命令，陽奉陰違，同時，散佈共黨毒化思想，一時西北地區，赤化危機，極為嚴重，中央為集中抗戰力量，在武漢成立第六部，以陳立夫為部長（後改組為政治部，陳誠繼之），黃琪翔、周恩來副之，張厲生任秘書長。下轄四廳：第一廳（主管軍隊政訓），由賀衷寒任廳長，袁守謙副之；第二廳（主管民眾組訓，民眾運動，國民黨訓），由康澤任廳長，杜心如副之；下設二處，一處由梁幹喬任處長，二處由杜心如自兼。第三廳（主管文藝、電影、戲劇各種宣傳）由郭沫若任廳長，田漢副之（二人均共黨）。第四廳（主管總務），由趙志堯任廳長，其副廳長姓名失記。（似為莊明遠？）

其時，康澤已身兼數項要職——計（一）政治部第二廳廳長；（二）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總隊長；（三）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；（四）禁烟總監部緝私室主任；（五）中華復興社總社書記……等，復在蔣公身邊，擔任臨時性特定任務。如與中共保持密切聯繫，即其一端。此為康氏一生中，「權勢」與「責任」最繁重的時期。所主持的各單位公文，常無暇批閱，而必須利用由漢口至武昌，往返乘坐專用汽艇的頃刻時間，由幕僚人員，持請批閱或指示，甚或授權幕僚人員處理之。

當時，軍委會政治部設了四個廳，有人笑郭沫若、田漢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廳，謔稱為「跳舞廳」，共黨人員遂反唇相譏，因第一廳主管軍隊政訓，賀衷寒每天要接見各軍師的政治部主任，

就稱為「客廳」；對第四廳的趙志焄，因為他主管總務經費收支，天天算帳，大筆用錢，稱之為「理髮廳」；他們最恨的是第二廳的康澤，而第二廳集合許多古怪刁鑽的人才，搞得共匪哭笑不得，所以稱第二廳為「飯廳」，意思是說第二廳從康澤起，都是飯桶，康聽了大笑。某日，第二廳開廳務會議，康主持致詞，說：「他們罵我們是飯廳，好的，我們一定要更加努力，把飯吃光，讓他們吃不成。」寓意甚深，亦云趣談，為戰時插曲也。

這一時期，康澤在武漢，經常與何應欽將軍的辦事處保持接觸，供給中共軍事動態，並擔任與由共軍改組的第十八集團軍聯絡事宜。復由康向蔣公簽保派駐延安人員，以徐佛觀（曾任東海大學教授，在台逝世。）任首席代表，郭仲容等三人為代表（其餘二人，一時失記），康之任重道遠，概可想見。其後，何應欽將軍的辦事處遷至重慶，康為密切配合起見，並加派袁永馥參與其事（袁號念勤，四川人，政大畢業，曾任臺灣區電信黨部書記長，六十五年十二月病逝）。

斡旋川局從事團務

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—戊寅）一月二十日，川康綏靖主任劉湘在漢口病逝（卒年四十八歲），政府受日軍壓迫，準備遷川。其時，王陵基任四川保安處處長（廿六年八月十日到職），頗具實力，發出通電，對川省府人事，有所主張，發生暗潮。新任主席張羣未到任前，由省府秘書長鄧漢祥暫行代理。川康綏靖主任，則由綏署總參

議鍾體乾代理。四月，政府派王續緒代理四川省主席。五月，任王陵基為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。八月，省府改組，仍由王續緒代主席，調張羣先生為重慶行營主任。王陵基原任保安處處長，派劉湘舊部劉兆黎接替，副處長一職，經由康澤薦王元輝擔任。康兆民對於川局幕後之奔走協調，實際上付出了相當的心力，對四川局勢之穩定，所關至鉅，或未為外間所盡知也。

同年六月，「復興社」在武昌大江中學集會，遂從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，宣告結束，改組為青年團。七月九日，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，在武昌湖北省黨部原址，正式宣告成立。旋遷至漢口和街（舊日租界）九號辦公。蔣公自任團長，由朱家驊代陳辭修（誠）為書記長，康澤代胡宗南為組織處處長（到重慶後真除）。同時，成立青年團武漢支團部，由康澤兼主任（見樂恕人「懷人紀事集」，第一三七頁。時報出版公司印行。），成立戰時青年服務總隊，由康兼

總隊長（見同上），號召全國青年大結合，藉以搶救戰時青年，防止其流亡陝北，參加中共的「抗日軍政大學」。使之行動一致，力量集中。不一年，青年團組織，已遍布於全國各階層與學校，要皆康澤不遺餘力，盡瘁所致。

「三民主義力行社」，與「中華復興社」由二十一年三月成立，一直延續到二十七年六月，在武昌大江中學結束，為時達六年三個月，由蔣公直接領導。負責安內攘外，剿匪以抗日，對革命建國，曾作最大的貢獻。它的秘密的組織力量及其成就，遠大於公開的組織與影響，自然非幾句話，可以說完；事實上確有其深厚的、實質的、長遠的影響。其主要幹部，除康澤外，有賀衷寒、劉健羣、滕傑、蕭贊育、鄧文儀、鄭介民……等等，因限於篇幅，無法一一詳敘。讀者欲知其詳，筆者曾著有一本「動亂的回憶」，詳敘其事，請參閱，便可了然其一切組織實況及其活動與成就。

存簿儲金四大優點

- 一、利息免稅：半年結息一次，免扣利息所得稅。
- 二、機構普遍：全省大小郵局壹仟餘處。
- 三、營業時間長：平常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。
星期日：（一）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基隆、台南、嘉義等六局全日營業。
（二）其他各局上午半日營業。
- 四、手續簡便：單元作業，隨到隨辦。

象印物人雲風國民「邁天黃 圖插「記

(頁六十四見文)

相照的時員導指班訓政會委軍任澤康



超倪、邁天黃、鳳人毛、強文起左排前
洲仙陳、才家喬、武其潘起左排二，凡
。影合



陳敦正「康澤的生平與志事」插圖

(文見八十六頁)



國陸大「士女影竹王頁八十三見文」影合婦夫飛振俞與(右)彭世楊家劇戲美旅
(「灰劫歷劇